

漢字文化生態學研究與《漢字中國》叢書編纂

張玉金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摘要 汉字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首先要研究汉字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汉字跟别的文化现象一样，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所以要研究汉字与它的创造者——汉人的关系。汉字是在特定文化生态环境中创造的，所以还要研究汉字与其文化生态的关系，即汉字与自然、汉字与经济、汉字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要想全方位考察汉字，就要研究下述五个课题：一是汉字与汉人，二是汉字与文化，三是汉字与自然，四是汉字与经济，五是汉字与社会。从汉人、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的角度研究汉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汉字，研究一个个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形义关系，二是研究汉字的一些理论课题，如汉字的性质、汉字的特征、汉字的寿命、汉字的发展、汉字的结构、汉字的形音义关系、汉字的传播等等。

关键词 汉字；文化背景；文化生态

中国学者对汉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这方面有汉字学史的著作可以参看，如黄德宽、陈秉新两先生的《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这里不再赘述。

当代汉字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就汉字（有时联系汉语）研究汉字，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如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等等；二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这方面的著作也有不少，如何九盈先生的《汉字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和《汉字文化大观》（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王继洪先生的《汉字文化学概论》（学林出版社 2006 年版）、周有光先生的《汉字和文化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刘志基先生的《汉字文化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等等。可见，当代学者对汉字研究的视野是开阔的，对汉字的研究也是深入的。

一、汉字研究的文化生态视角

笔者主张，不但要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汉字，而且要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考察汉字。

所谓文化生态，是一个借用概念，它本是生态学的基本范畴。生态学是德国动物学、进化论者恩斯特·海克尔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创立的，是一门探讨有机体与外围环境相互适应状态的科学。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逐步从以生物界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社会为主体，从主要考察自然生态系统过渡到主要考察人类生态系统。这种研究与文化学结合，便产生了文化生态学。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 1955 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生态主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赖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

冯天瑜等指出，作为自然——社会的双重存在物的人，是在自然场与社会场相交织的环境中创造文化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自然场是指人的生存与发展

所赖以依托的自然界，社会场是指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结成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大略分为经济和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所谓文化生态，是自然场和社会场的整合，可以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自然环境，是指被人类改造、利用，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自然系统。地球表面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外层空间，以及对人类生活发生久远作用的宇宙因素，共同组织这个自然系统。自然系统日益渗入人类的主观因素，所以可以称为“人化的自然”。

经济环境，是指物质生产方式，如农林业、游牧业、手工业、商业等。这些经济环境本身既是广义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又是狭义文化（即观念形态文化）植根的土壤和赖以生发的物质前提。

社会环境，是指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以及按照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大小的人类社会群体，如家庭、家族、种族、民族、阶级、阶层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社会环境既是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狭义文化赖以生长发育的社会组织前提。

文字是一种文化现象，首先要研究文字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文字跟别的文化现象一样，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所以要研究文字与它的创造者——汉人的关系。文字是在文化生态环境中创造的，因此还要研究汉字与文化生态的关系，即文字与自然、文字与经济、文字与社会的关系。要想全方位考察汉字，就要研究下述五个课题：

- 一是汉字与汉人
- 二是汉字与文化
- 三是汉字与自然
- 四是汉字与经济
- 五是汉字与社会

从汉人、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汉字，其实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汉字，研究一个个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形义关系，二是研究汉字的一些理论课题，如汉字的性质、汉字的特征、汉字的寿命、汉字的发展、汉字的结构、汉字的形音义关系、汉字的传播等等。

二、文化生态视角与具体汉字研究

首先要从汉人、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汉字，为研究汉字的一些理论课题奠定基础。为此，笔者主编了《汉字中国》丛书，旨在系统探究汉字与汉人、汉字与文化系统、汉字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关系。

《汉字中国》丛书目前共包括 5 大研究课题 39 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都写成一本书。

（一）汉字与汉人

汉字与汉人这个大课题下目前只有 1 个子课题，即“汉字与人体”。古人创造汉字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体是古人创造汉字时最常描摹的对象。许多汉字是由人的整体形或部分形所构成的，如“大”像正视的人形，“女”像双手交叉在腹前跪坐的女人形，“口”像人嘴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汉字是由人形和其他事物之形组合在一起构成的，如“争”像双手争夺一物之形。

（二）汉字与文化

汉字与文化这个大课题可分为四个中课题，即汉字与物质文化、汉字与制度文化、汉字与精神文化、汉字与文化心理。这种划分是依据对文化结构的分析。研究文化的学者们认为，文化结构首先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在这文化结构的每一层次

中都蕴涵着文化心理。文化心理的结构也可以分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三个层次。文化心理每一层面与其相邻层面之间都是一种双向对流的关系,在这种互相制约、互相渗透的关系中,文化心理的三个层次被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汉字与物质文化这一中课题,探究汉字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以满足人们物质需要为主的文化产物,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处园林文化、日用器物文化、舟车交通文化和工具器具文化等等。在这些文化中,劳动工具文化处于核心位置,它制约着物质文化各个方面的面貌。物质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点,其中凝聚积淀着制度文化的因素和观念形态文化,它还是表现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最直观的方式。本丛书汉字与物质文化这一中课题下,目前有6个子课题,即汉字与饮食、汉字与服饰、汉字与建筑、汉字与交通、汉字与玉石、汉字与文房四宝。每个子课题都写成一本书。

汉字与制度文化这一中课题,探究汉字与制度文化的关系。所谓制度文化是人类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文化产物,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实行上述制度的各种具有物质载体的机构设施,以及个体对社会事物的参与形式,反映在各种制度中人的主观心态等。在上述制度中,政治法律制度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社会的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的主要内容,把各种制度以法的形式确立起来。制度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中凝聚积淀着观念形态的文化。特定的政治制度总与人的文化心理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相适应,是由作为物质文化核心的人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所规定的。本丛书汉字与制度文化这一中课题下,目前只有2个子课题,即“汉字与刑法”、“汉字与度量衡”。

汉字与精神文化这一中课题,探究汉字与精神文化的关系。所谓精神文化是人类的文化心态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对象化,包括社会意识诸种形式。社会意识形态按照它与人们现实的社会存在之关系的远近被区分为低级意识形态和高级意识形态。低级意识形态是指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伦理学说等。高级意识形态包括艺术、宗教、哲学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都直接地反映着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一般状况,具有时代的特色和民族的特点。精神文化是由物质文化所决定和制约的,也为制度文化所制约。本丛书汉字与精神文化这一中课题下,目前有8个子课题,即“汉字与乐舞”“汉字与书法艺术”“汉字与神话”“汉字与对联”“汉字与数目”“汉字与医疗”“汉字与色彩”“汉字与经典”等。

汉字与文化心理这一中课题,探讨汉字与文化心理的关系。前面说过,文化心理的结构,也可以分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三个层次。所谓文化心理的表层结构,是指浮现在社会文化表面、笼罩和散发着感情的色彩和光辉的某种意向、时尚或情趣,它包括人们的情感、意志、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要素。直接制约着文化心理表层结构的,是文化心理的中层结构,它包括社会经济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审美观念、宗教观念、哲学观念等,是文化心理的理性积淀的层面。制约文化心理表层结构和中层结构的是深层结构,它根源于各民族由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所走的不同路向,是对人类心灵深处所包含的五对永恒矛盾的解决方式的总和。这五对矛盾是入世的与出世的、情感的与理性的、个体的与同类的、理智的与直觉的、历史的与伦理的矛盾。对于这五对永恒矛盾的解决方式,构成不同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致思途经和价值尺度。本丛书汉字与文化心理这一中课题之下,目前有9个子课题,即“汉字与民俗”“汉字与姓名”“汉字与避讳”“汉字与测字”“汉字与字谜”“汉字与宗教”“汉字与道德”“汉字与审美”“汉字与思维方式”等。

(三) 汉字与自然

汉字与自然这一大课题,探讨汉字与其他自然环境的关系。所谓自然,就是地理环境。依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华文化赖以产生的自然环境,在古代是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环境,在近代是逐渐开放的大陆——海洋型环境。中华文化,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这种自然环境密切

相关的。所以研究文化时不能不考虑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汉字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考察汉字时，也要联系它的自然环境。在创造汉字之时，自然环境对汉字的影响是很大的，古汉字有不少是法之自然的。不唯汉字如此，其他几种古老的象形文字亦然，如古苏美尔文字的图形就受自然因素的深深制约，这种文字的图形准确地再现了公元前 4000 年代中期美索不达美亚的自然景观。我们的汉字作为一种表象符号，它同样映现着创造汉字之时汉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本丛书汉字与自然这一大课题下，目前有 4 个子课题，即“汉字与植物”“汉字与动物”“汉字与地理”“汉字与天文”等。

（四）汉字与经济

汉字与经济这一大课题，探究汉字与经济环境的关系。所谓经济指物质生产方式，它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经济生活的土壤。依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华文化赖以产生的经济环境，在夏商周时代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在秦汉至明清时代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地主经济，在近代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地主经济同工业商品经济并存。研究中华文化时，要联系到它的经济环境，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汉字时，也要联系到它的经济环境。本丛书汉字与经济这一大课题之下，目前有 4 个子课题，即“汉字与农业”“汉字与渔猎”“汉字与手工业”“汉字与贸易”。

（五）汉字与社会

汉字与社会这一大课题，探究的是汉字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所谓社会，是人类为了自我生存及繁衍而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按照一定的关系和组织形式、制度形式结成的各种群体。依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华文化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在夏商周时代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分封制社会，在秦汉至明清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君主专制社会，在晚清民国时期是宗法君主专制、宗法军事独裁制。任何文化都是社会文化，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研究文化问题不能抛开社会，要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汉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也和人类社会息息相关。要想真正弄懂汉字，就要全面而深入地考察社会对它的影响和制约。不考虑社会因素，许多文字现象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本丛书汉字与社会这一大课题下，共有 5 个子课题，即“汉字与婚姻家庭”“汉字与宗法”“汉字与职官”“汉字与战争”“汉字与汉语”等。

《汉字中国》丛书共有 39 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都包含丰富的内容。总的原则是在汉人、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的背景下阐释一个个具体汉字的形义。这样可以揭示每个汉字所蕴涵的丰富文化信息，能够说明每个汉字何以有此形、何以有此义，何以有此形义关系，从而达到对汉字的深刻理解。下面看看《汉字与玉石》这本书的纲目：

一、玉料与治玉

（一）玉料及相关汉字

（二）治玉及相关汉字

二、玉石与崇玉

（一）玉石及相关汉字

（二）崇玉及相关汉字

三、玉器与用玉（上）

（一）祭祀用玉器及相关汉字

（二）丧葬用玉器及相关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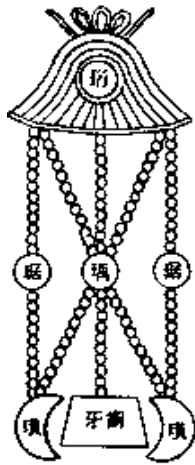
四、玉器与用玉（下）

（一）政治用玉器及相关汉字

（二）装饰用玉器及相关汉字

以“珩”字为例，如果查字典，只知道它的意义是佩上的横玉。从玉、行声，为形声

字。但如果联系文化生态背景，则知道它是古人在腰间佩带的一组玉佩上的横玉。如下图所示：



进一步考察知道，古人佩玉，主要不是用以装饰自己，表现外在美，而是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程度，也就是表现道德。依据《礼记·聘义》的记载，古人认为玉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道、德等十一种品质，而这些品质是一个君子应该具备的。所以古代君王必佩玉，也即要求君子时时刻刻用玉所具有的品质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道德，用鸣玉之声限制自己的行为动作。

知道这些内容，我们对“珩”字的认识就更为深刻。同时，我们会认识到，“珩”字中的声符“行”不仅仅有表音作用，应该也有表义作用。因为“珩”作为玉佩的重要成员，与其他成员一起，起到节制佩带者行步的作用，使其行步合于章法。

三、文化生态视角与汉字理论研究

实际上，从汉人、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系统角度，不但可以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汉字，更可以研究一些汉字的理论问题。

从汉字与汉人的角度，可以很好地解释汉字的简化、繁化等问题。汉字的简化主要表现在汉字字符的简化和汉字字体的简化上。汉字的字符（也就是汉字的组成成分，如“梅”中的“木”和“每”）从古至今主要是简化，以“车（車）”为例，它在殷代的金文中像是古代的单辕车，字形比较繁复，到了篆文里，它已经简化为“車”了，到了今天更简化为“车”。汉字字体也是不断简化。汉字字体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文字阶段、隶书阶段和楷书阶段。古文字变为隶书应该看作汉字形体上的一次重要简化，因为隶书比古文字写起来容易得多，而由隶书变为楷书也是这样。汉字字符、汉字字体为什么一直在简化，这显然要从人的需要来加以解释。文字是由人写出来的，而书写汉字的人对汉字有便于书写的要求，汉字字符和字体的简化正是适应了这样的要求。

与汉字字符和字体的简化趋势相反，汉字的结构则有繁化的趋势，如“祖”字原来只写作“且”，“赐”字原来只写作“易”。汉字的结构为什么会出现繁化的趋势呢？这也应该从人的需要出发来加以解释。汉字是一种自治的交际工具。它不但有发的一方，还有收的一方。汉字的接收者对汉字有便于理解、便于由形知音义的要求。因此，汉字的结构才会有繁化的趋势。其实，任何文字体系在历史的发展中都会有“简化”和“繁化”两种趋势。以西文拼音文字为例，它的书写单元（字母）虽然尽可能简化了，但是它的书写形式（字）却不能不繁化，否则人们就没法看懂这种文字。

从汉字与文化的角度，可以较好地解释汉字的结构特点。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汉字中

的一个书写单元大都是由多个成分组合而成的，具有“群”的特征。例如“寇”是由“宀”“元”“支”构成的，“聖”是由“耳”“口”“壬”构成的。而西方拼音文字一个书写单元则具有“单”的特征。这种特征还表现在其他的文化现象上，如中国的建筑，诸如皇宫、侯门、相府，都不是孤立的一字一室，而是由主屋、从屋或者宫殿、楼阁、门廊、亭榭构成的庞大建筑群。而西方的建筑具有“单”的特征，如欧洲的皇宫是一字一室的孤立建筑，平地突兀而起；其乡村的保垒，也是一字一室的建筑物。中国汉字结构的“群”特征，可以从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来加以解释。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在个人与社会群体这对关系中，更偏重于社会群体。之所以会是这样，是由于中国保留了血缘宗法制度，个体与宗族之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密切的联带关系。在经济上，“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在政治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由于中国的思维模式偏重于类，所以汉字的书写单元乃至其他一些文化现象，都呈现出“群”特征。西方的思维模式，在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中，更偏重于个体，所以西方文字乃至其他一些文化现象具有“单”的特征。

从汉字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较好的解释汉字寿命的长久。我们知道，世界上几种古老的表意文字体系都死亡了。古埃及文字，由于埃及先后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罗马所征服，由于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的传播，逐渐被希腊文字排挤出去。苏美尔文字，也由于山区埃兰人部落对苏美尔的蹂躏，不再被人们使用。而汉字却一枝独秀，不但能生存下来，而且至今呈现出勃勃的生机。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可以从语言上加以解释（汉字较好地适应了汉语的特点）之外，还可以从文化上加以解释，这就是中国文化突出的延续性、保守性和不同寻常的抗排挤能力。古希腊罗马文化因日尔曼人入侵而中断，古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衰亡，而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一以贯之。这是汉字长寿的文化成因。中国文化的这种特性，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中国地理环境是相对隔绝的，它的北边是比较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西南是最高大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面临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这种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汉字寿命的长久。

从汉字与经济的角度可以较好地解释汉字的结构特点和发展特点。汉字是语素文字，而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单位，语素的音要求一个汉字的字形反映它，语素的义也要求字形反映它，这就是一对矛盾。在上古时代，人们常用简要的图形反映语素的意义，这样产生的字是表意字。有时用现成的音同音近字反映语素的声音，这样的字叫假借字。表意字和假借字都是走极端，不是“执其中”。后来人们处理这对矛盾时是采取折中的办法，在一个汉字中，既反映语素的意义，也反映语素的声音，这样产生的字就是形声字。一让两有，形声并列。形声字是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矛盾的，所以在周人取得天下之后，经历了不长时间，形声字就在全部汉字中占有绝大多数了。这就是汉字结构的中庸精神。前面说过，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字符和字体的简化，也有一个汉字结构的繁化，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味的简化，而是简明。此外，汉字的发展既有音化，也有意化。这就是汉字发展的中庸之路。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在许多方面都有反映。中国人的基本人生态度，既非积极的，也非消极的，是即世间而求出世的。因此，汉人既少有古希腊人那样征服自然的精神，也很陷入印度式的出世的玄想。古代君子的为人，不应该“过”，也不应该“不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要“文质彬彬”，要“温柔敦厚而不愚”。古人为政，应该是“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和政。古人的音乐也是“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低、行而不流”的中声。中庸精神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古代主要是农业文明，这种经济环境影响到汉人。农业型自然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这种心态使得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中庸精神是一种顺从常规节律的精神，这同农业社会的运行机制直接联系着。

从汉字与社会的角度，可以较好地解释汉字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前面说过，汉字寿命

之长久是很独特的，究其原因不但与自然环境有关，与古代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的。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制度的社会，宗法制度规定社会全体成员按照各自的宗族系统尊祖敬宗、孝亲睦邻、崇尚古代、尊重传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不是以玄虚的“彼岸世界”调整人们现实的不平，而是以宗族组织、血缘心理、伦理亲情、道德追求来调节不平心理。在中国古代，具有崇高地位的不是神灵，而是祖宗、圣人。汉字过去认为是圣人仓颉创造的，在人们心目中是尊严无比的，过去主张崇拜圣人，敬惜字纸。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要废除汉字是不可想象的。

古代汉字学的崇高地位，也可以从中国的社会环境加以解释。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下形成了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伦理与政治的联姻是中华文化系统的一大特征。由于是这样一种文化范式，所以尊崇儒学就是必然的。因为儒学就是一种“伦理——政治”型学说体系。这种学说体系包括内在的人的主观伦理修养论和外在客观政治论这样两个彼此联系的部分，前者即所谓“仁”学、“内圣”之学，后者即所谓“礼”学、“外王”之学。由于儒家学说主要记载在以十三经为代表的经学著作中，所以古代经学的地位十分崇高，如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著作。经学重要，汉字学也就重要，因为经学是先秦时代的古书，要想通经，必须明白汉字的形音义。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许慎之子许冲也说“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盖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说文解字·后叙》）

此外，考察汉字的产生、汉字性质的变化、文字异形、文字整理等课题，都必须联系到汉字所处的社会环境。比如完整的文字体系之所以最终形成，是由于国家的诞生。国家的诞生对汉字完整的文字体系的形成有了强烈的需求。正是适应这种需求，汉字才产生的。汉字最初是表词文字体系，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汉字由表词文字变成了词素——表词文字。又如国家的分裂，会导致文字异形；国家的统一，就要进行文字整理，统一文字。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研究汉字的理论问题，只是举例性的。但由此已经可以看出从文化生态角度来研究汉字理论问题的重要性。

总之，可以从文化的创造者——汉人、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对汉字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不但可以研究一个个具体汉字的形义，也可以研究许多汉字的理论问题。由于不是仅就汉字论汉字，或仅就汉语论汉字，而是对汉字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对汉字的认识就更为深刻。目前对一个个具体汉字的形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这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期待今后对汉字的理论问题也进行这样的研究，从而推动汉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
张玉金《当代中国文字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
张玉金、夏中华《汉字学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张玉金《汉字与玉石》，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
张玉金主编《汉字中国》丛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起。